

言犹未尽

YAN YOU WEI JIN
LI MA DOU

利玛窦

黎玉琴
主编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言犹未尽

YAN YOU WEI JIN
LI MA DOU

利玛窦

黎玉琴 主编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言犹未尽利玛窦 / 黎玉琴主编. -- 广州: 世界图书
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2013.7
ISBN 978-7-5100-6658-0

I. ①言… II. ①黎… III. ①利玛窦 (1552 ~ 1610) —
人物研究—文集 IV. ① B979.954.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60136 号

言犹未尽利玛窦

策划编辑 赵 泓
责任编辑 阮清钰
封面设计 陈 璐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电 话 020-84459702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1.25
字 数 170 千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00-6658-0/K·0176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和 飞

人类文化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文化交往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宗教传播就是文化交往的一个重要实现方式。在近代以前，中国传统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大规模接触在历史上有两次：第一次是两汉、魏晋、隋唐时期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第二次是明末清初以利玛窦等耶稣会士为代表的欧洲传教士的东来。第二次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扩张、宗教改革、文化复兴以及当时中国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中西文化交流。和佛教文化单向度影响中国不同，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不仅热衷社会活动宣教孜孜，更是具有深厚学术素养和丰富教义体悟的知识精英，其在华的宗教传播活动实现了中西文化交往的首度大规模双向对撞，促进了中国和文艺复兴之后欧洲高层知识界之间的一次直达本源的接触和对话，成就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令人陶醉的一段斑斓史实。

自 1583 年从澳门来到肇庆，利玛窦在肇庆居住了六年，是其在华时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间，利玛窦打造了开启中西文化交流大门的钥匙，所创业绩，有不少堪称为“中国第一”：建起了中国大陆第一座天主教堂；以及中国第一所西文图书馆；绘制了世界上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图；制作了中国第一台机械自鸣钟；编纂了世界上第一部中西文辞典《葡汉辞典》。更重要的是，这些完全不同于传统中国文化所呈现出来的景象，在当时都极大地触动了中

国官员和文化精英，对这些位于中国文化高层的大人物们在心灵深处产生的影响是震撼性的。因此有学人评价说，尽管传教士们的所作所为“虽然如流星过夜天，其影响总体上是微弱的，但无疑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了清新的气息，产生过明亮的火花。”^[1]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来到中国，虽然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扬教布道，向中国输入西方宗教价值观，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国带来了当时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思维方法。尤其是西学的传入和它所倡导的科学精神及科学方法与当时中国的经世实学思潮一拍即合，对中国学术体系的进一步完善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耶稣会士通过著书立说及其传教所设立的独特报告制度，将中国的经籍和思想介绍到西方，从而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耶稣会士在中国的布道活动，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国礼仪之争，开启了东学西渐之门，这种争论从宗教界扩大到思想文化界，成为18世纪以来西方热衷于中国文化研究的缘起。其后的二百余年的时间里，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日益频繁，西方的汉学研究也在历史语境的转换中演化。事实上，他们的工作和研究成果（无论是翻译成果还是专著、论文还是资料汇编），不仅推动了中外学术交流，而且为建立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个领域的学术体系做出了积极贡献，同时也得到了中国同行的高度重视。由于他们的研究是基于其特定文化背景构成的“前见”，与中国同行的研究有完全不同的角度，因而具有相辅相成的和彼此互补的品质。时过境迁，当我们再回首看看利玛窦们并不成功的传教事业，这还真有些“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意味！

特别是近百年中，在中国文化史上“古今中西”之争已成为这一时代文化讨论的主题。因此，对中国人来说实际上存在着三个互相联系的问题：如何对待原有传统文化，如何吸收外来西方文化，以及如何创造中国的新文化。对此，一般存在有三种不同态度：一种是对传统文化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这可称之为急进主义派；一种是对传统文化采取全面肯定的态度，这可称之为保守主义派；一种是对传统文化采取无可无不可的态度，这可称之为自由主义派。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曾有一种比较偏执的观点认为，只有其中

[1] 顾卫民著，《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9页。

某一派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益，而其他两派则是有害的。其实，在当一种文化处于重要的转型时期，这三种力量毫无疑问是并存同一框架之中，它们之间的张力和搏击恰恰是推动文化发展的重要契机。因此，从明清之际的这一段文化交往史实出发，寻求中西文化交往实现的作用机制，这对于把握中西文化的发展以及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文化交往都是极具意义的。

21 世纪被许多人称为“中国的世纪”。不管这一提法是否有可以支撑其成立的科学根据，但至少有一点是不争的事实，即中国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地区之一，在国际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正日显其重要性。中国正面对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大潮，走和平发展、建立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道路，实现众人追逐的“中国梦”，是我们必须坚守的根本方向。为此，现代西方的和我们固有传统怎样才能在走向现代中国的途路中融通无阻、化育新生，不能不成为有关怀的当代学人焦思渴虑的问题，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五四”一代学人为我们奠立了一个好传统，这就是融化新知而又不忘记本民族历史地位的传统。因此，在 21 世纪的今天，研究利玛窦，研究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士所推动的中西方文化交流活动，无疑对于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一代中国人心中的“中国梦”，促进世界范围内文化多样性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肇庆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曾经发挥过桥头堡的作用。为了进一步挖掘历史，助益当代，我校立足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得益于地方政府大力支持，筹资成立了“西江历史文化研究院”，并其中设立“利玛窦与中西文化交流研究中心”，本书正是该研究中心中几位成员的专题性研究成果。尽管在这些研究中，由于每位作者的思考角度、学科背景以及知识结构等方面的差异，进而导致对一些共同问题存在着不一致的看法，但这并不妨碍本人乐见这份成果的问世，因为人皆尽知：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本人衷心期待她能够经受学界的检视，同样也希望能够对利玛窦研究做出贡献，哪怕是一星一点都是令人欣慰的。当然，我还希望研究团队能够在这个领域拿出分量更重、水平更高的成果。

是为序。

目 录 | Contents

I	序 / 和 飞
001	一、缘起 碰撞 型构 / 韩月香 ——利玛窦适应性传教思想的渊源
029	二、岭南文化圈时期的利玛窦散论 / 黎玉琴
056	三、利玛窦与谭谕 (Tansiaohu) / 宋黎明
067	四、《利玛窦中国札记》“Scielou”人名考辨 / 刘利平
079	五、危机与应对 / 赵玉田 ——“利玛窦现象”时代检视
104	六、重新认识利玛窦在华传播科技的历史 / 何凯文 ——以利玛窦在岭南地区建构“行动者网络”为例
128	七、在近代科学理性与传统经学思维之间 / 钟玉发 ——以徐光启与阮元科技思想为中心
154	八、利玛窦视野中的中国法律 / 王超杰 宋 磊

缘起 碰撞 型构

——利玛窦适应性传教思想的渊源

韩月香

从明末开始,天主教的传教士们逐渐进入中国。在传教过程中,利玛窦等人所代表的耶稣会士入乡随俗,不但将传教士的着装换成了中国士人的服装,而且把教义中 God/Deus 称作中国人熟悉的“天”或“上帝”,并允许中国的教徒祭拜祖先、祭祀孔子,这种以适应中国文化为原则的传教策略,是利玛窦对于耶稣会创始人罗耀拉为该会制定的两大原则——走上层路线、灵活传教——的具体运用;不仅如此,耶稣会的人文教育也为利玛窦的以文化、科技作为传教的主要手段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正是因为利玛窦式的灵活传教,才使得中西文化的交流达到了当时前所未有的程度和高度,正是基于此,我们认为适应性传教策略或利玛窦政策有不可低估的思想价值和客观效果。当然,在生活方式、伦理、术语、礼仪方面顺应中国人的传统做法,并不意味着利玛窦真的认为中国文化与天主教会的规定与教义就毫不冲突,而且利玛窦适应性传教策略也有一个形成过程,是利玛窦的教育背景、成长经历、传教实践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思想的变迁过程与传教政策的型构过程是一个极具学术价值的研究课题。

一、源起:利玛窦适应性传教策略的思想基础

耶稣会诞生于天主教面临新教挑战的时代,在欧洲出现宗教改革的同时,

“天主教复兴运动”也在天主教内部展开，耶稣会在这场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最大。耶稣会的思想倾向源自坚信基督教的人文主义者——被公认为“人文主义的一代宗匠”的伊拉斯谟。利玛窦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取得的成就，毫无疑问，取决于他的“适应性传教策略”以及他本人为此而做出的科学、哲学、技术等多方面的令人景仰的努力。利玛窦作为耶稣会士，有着良好的道德修养和丰富的科学知识，这与耶稣会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教育密不可分，而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和耶稣会的创立者伊纳爵·罗耀拉是两个不可忽视的人物。

（一）伊拉斯谟的基督哲学

被公认为“人文主义的一代宗匠”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约1466—1536）对基督教的影响巨大，在宗教改革的浪潮中，新教、旧教都试图拉拢他，都想运用其思想的影响力。

作为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对天主教的态度一直是相当忠诚的，他尊敬各种各样的圣职，认为“牧师一职是具有某种神性、某些超脱人世的東西，没有什么与他那高贵的位置相称，除了天堂里的东西，这是圣灵从神圣的团体——教会中选择的人，这个人具有最高的位置”^[1]，而牧师和主教职位的高贵，在伊拉斯谟看来，并不在于他们行使的权力，而在于他们为基督徒的服务，这一见解，显然已经具有了人文主义的色彩。

伊拉斯谟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丰富多彩，庞杂繁芜，但是也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自由意志。在中世纪神学思想中，人们认为人是没有自由意志的，人的意志不过是上帝意志的表现与反映，所以，人的意志与行为必须完全为了上帝、属于上帝、归于上帝。但是，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潮对这一问题有了自己的解读。他们认为，人类的尊严、美德、价值与创造力都来自于人的自由意志，而这一解释不仅没有亵渎神的恩典与荣耀，相反，却是对神的伟大的肯定。伊拉斯谟也持有这一观点，他在《论自由意志》中批

[1] 郭灵风著，《战争、和平与“基督教共同体”——伊拉斯谟思想述论之一》，《欧洲研究》，2005年第2期，第112页。

判了否认自由意志的观点，明确主张人有自由意志，并且指出自由意志是道德的基础，如果人没有了自由意志，那么人就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人的行为就无所谓善与恶；如果没有了善与恶，也就谈不上罪与罚。他说：“假如意志不是自由的，就不能把罪归因于人，因为意志若非自愿，罪就不能成为罪。”^[1]

第二，人神合作。在上帝的恩典与人们的自由意志关系上，伊拉斯谟并没有像其他人文主义者一样走入完全否定神的作用的极端主张中，而是主张人神合作说。他说：“我赞成人仍把每个事情都归因于首先激励我们灵魂的恩典的吸引，而不赞成仅把某些事情归因于人类意志的持续努力，这种行为并没有把人从神圣的恩典中拽走。因为万事都有三个阶段，开端、持续与结束，恩典归于两端，而只有在持续阶段，自由意志才能发挥某些作用。上帝的恩典与人类的意志这两种原因在同一工作中相遇，恩典是第一因，意志是第二因，没有第一因，意志毫无作用，因为第一因本身就有足够的力量。”^[2]作为基督徒，伊拉斯谟并不否认上帝恩典的重要性；作为人文主义者，他也不想否定自由意志的作用。这种认为上帝的恩典为第一因，人的自由意志为第二因的思想，为近代欧洲哲学的不可知论打下了基础，是人的有限理性思想的先导，有非常重要的启蒙意义。

第三，真神学。伊拉斯谟的人文主义思想还表现在对中世纪神学（经院哲学）的批判分析上，伊拉斯谟指责经院神学所追求的精致论辩、难懂的抽象名词、系统的智力公式以及繁杂的外在仪式，都与真正的神学无关，真神学是简单、朴素的信仰，是未加矫饰的话语，是内心的虔诚，“是路，是真理，是生活”。伊拉斯谟认为经院哲学最终会导入对人的精神专制，我们的信仰不能统一在经院神学的名义下，必须统一在基督的名义之下，信徒们服从的是神而不是人。这一思想为新教改革打下了基础，对教会的绝对性、垄断性提出了挑战，为人——神关系的直接对接开辟了逻辑可能。

第四，宗教宽容。伊拉斯谟相信虔诚能够净化道德，并由此推导出宗教

[1] 奥尔森著，《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吴瑞诚、徐成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2页。

[2] Erasmus—Luther, Discourse On Free Will. Translated by Emst F. Winter,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 Inc. 1961. 85—86.

宽容思想。他主张：“凡属真理，即可为基督教义。”^[1]认为人们的虔诚不仅来自对圣经的领悟，还来自于任何时代地域的智慧，其中包括“异教”的古代文化。这一思想表明伊拉斯谟已经跳出了中世纪信仰的狭隘世界，对于不同信仰开始采取理解和宽容的态度，反映出其基督教人文主义海纳百川的精神追求；同时，他还提出真理，不论以何种形式出现，均为神赐的观点，这对人类的伦理道德有重大意义。也正因为如此，伯恩斯·拉尔夫在《世界文明史》中说：“他们（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主要从道德观点上解释基督教。”^[2]把对宗教的虔诚归于道德的纯化要求，这种思想对耶稣会影响很大。

第五，返本归真。伊拉斯谟竭力把古希腊文化的思想遗产同基督教以及希腊哲学家的学说、新旧圣经结合为一体，伊拉斯谟的基督哲学的现实目标就是使教会回到他认为纯洁的早期状态中去，实现基督教的重生，重树基督教理想。从这个角度看，伊拉斯谟的基督哲学与其说是一种理论哲学，不如说是一种实践哲学，所以，西方史学家评论说：“伊拉斯谟及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大大地影响了所谓的‘罗马教会的改革运动’的初级阶段。”^[3]

虽然伊拉斯谟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与宗教改革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可是与路德教却是磕磕绊绊，伊拉斯谟曾半开玩笑地说：他自己首先下了蛋，然后路德用这个蛋来孵鸡，然而路德孵出来的却是一只斗鸡。作为一个激进派，路德不仅反对教会的腐败，也反对教会本身，他的因信称义的主张使作为等级存在的天主教会及教宗的权威成为多余，并最终促使天主教的分裂，这是伊拉斯谟不能接受的。伊拉斯谟当然也不认同教会内部的腐败，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抛弃教会，另立门户。伊拉斯谟始终如一的意愿就是避免教会的分裂，构建基督教共同体的和谐，他不希望因为信仰而发生战争，在他看来，信仰的冲突决不能通过战争来解决，而要通过“温柔和耐心”，疗治裂痕，接待不义。这是最早的“宗教宽容”的呼声，这样的追求，显然在路德的新教改革中找不到出路，伊拉斯谟的基督教哲学不得不转向了天主教内部，耶稣会成为他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的体现者。伊纳爵·罗耀拉的耶稣会几乎完

[1] 伊拉斯谟著，《愚人颂》，刘曙光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2] 伯恩斯·拉尔夫著，《世界文明史》，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17页。

[3] 布林顿·克里斯多夫、沃尔夫合著，《西洋文化史》（第四卷），台湾学生书局1995年版，第182页。

全继承了伊拉斯谟的主张：与伊拉斯谟一样，罗耀拉也强调人的自由意志的重要性、主张信仰的虔诚、重视灵修与道德磨练、注意兼容并包的知识教育和灵活的管理办法，可以说，罗耀拉以及耶稣会就是伊拉斯谟基督教人文主义精神的继承者和贯彻者。

（二）伊纳爵·罗耀拉与耶稣会

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会掌握着整个基督教，因而是一个影响遍及各阶级、公共及私人生活的社会团体”，^[1]在宗教、政治、文化教育等领域都发挥着巨大甚至垄断性作用。但是到15—16世纪，这一地位受到了挑战。天主教自身的腐化和世俗化、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与传播、民族意识的发展和地理大发现最终催生了宗教改革，天主教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16世纪上半叶，天主教不仅失掉了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大量地盘，即便是在控制力较强的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新教的影响也非常显著。当时意大利的许多知名人士，还有一些妇女，都很同情新教，到1535年，罗马本土已有3万多新教信徒，以至于后来的枢机主教皮埃尔·卡拉法对教皇保罗三世（Paul III, 1534—1549年在位）说：“整个意大利都被路德派的异端所传染，它受到政治家和教会人士的广泛拥护。”^[2]

作为天主教的坚定捍卫者和改革者，耶稣会就是诞生在天主教举步维艰的日子里。1534年8月，西班牙贵族伊纳爵·罗耀拉（Ignacio de Loyola 1491—1556）创立了耶稣会，1540年9月，教皇保罗三世宣布它为天主教的正规修会。罗耀拉意识到，要想使耶稣会真正成为天主教的新生力量，就必须根除教会上层和普通教士的腐化对天主教生存根基的侵蚀，改变教士的生活放荡、愚昧无知和缺乏责任感的作风，整肃内部，洁净教会，重塑形象，复兴天主教。而且罗耀拉认为教育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他规定教士应在主教管理的神学院中精心地接受关于神学、灵性和生活法规方

[1] 爱德华·傅克斯著，《欧洲风化史：文艺复兴时代》，侯焕阁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39页。

[2] 吴鹤鸣，天主教的反宗教改革，朱庭光主编，《外国历史大事集》，古代部分第二分册，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279页。

面的训练。

1548年,耶稣会在西西里创建墨西拿学院,“它是第一所为大众提供教育的耶稣会学校,是所有其他耶稣会学院的原型。它的建立标志着伟大的耶稣会教育事业的开端”,此后,耶稣会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到1773年,教皇克里门特十四世(1769—1774年在位)解散耶稣会时,它拥有会士23,000人,学校约800所,在校学生约20万。培养了利玛窦的罗马学院就创立于1551年,它与日耳曼学院在输送高级教职方面享有盛名。耶稣会的教育被誉为“现代世界第一个真正的教育体系”,开辟了天主教世界正规教育的新纪元。^[1]

高度认同伊拉斯谟人文主义思想的伊纳爵·罗耀拉,在耶稣会与耶稣会教育的创建与发展过程中,充分体现了伊拉斯谟的基督教人文主义精神内涵,提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措施、方法。罗耀拉于耶稣会建立之初,便着手编写该会的教学大纲,几经修订并最终于1559年定稿,这个《耶稣会教学大纲》(Ratio Studiorum)明显带有“耶稣会人文主义教育”的烙印。它规定修士不仅要学习托马斯·阿奎那的经院哲学,阅读记述圣人事迹的书籍,还要学习荷马、德摩斯梯尼、修昔底德、赫希俄德、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德、西塞罗、贺拉斯、奥维德等人的经典作品。教学被系统地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修辞学,第二阶段是哲学,第三阶段是神学。在前两个阶段中,耶稣会强调语言学习的重要性,要求学生熟练掌握古希腊语和古拉丁语,并试图通过在古典文学、哲学、历史和自然科学方面的教学,培养学生的逻辑思辨能力、口才、道德修养,力图使他们拥有广博的知识。很显然,这就是培养人文主义者的基本目标。而广博的知识、缜密的头脑、强大的逻辑思辨能力以及雄辩的口才,又为神学的理论学习与信仰的实践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由此可以看出,耶稣会把对古典智慧的热爱与基督教信仰合二为一了。事实证明,耶稣会确实是以人文主义教育著称于世并取得巨大成功的,因为人文主义思想对耶稣会、天主教甚至整个世界近代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耶稣会是伊拉斯谟等人文主义者既不完全认同路德教的新教改革,又不满意天主教内部腐败,试图在体制内寻找教会新出路的成功努力的结果之一,

[1] Frank Pierrepont Graves, A History of Education: during the Middle Age and the Transition to modern Time[M].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14, 217—218.

它坚持人文主义思想，尤其在教育中，人文主义渗入到了其神学和科学的各科的教育体系之中。人文主义者赞美人性，强调现世生活，充溢着浓厚的世俗精神，崇尚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神学与科学之间，罗耀拉与伊拉斯谟一样，并不想走极端，他们采取的是折中的办法，用人文主义精神去调和神学与科学的关系。在文艺复兴晚期的科学与神学的交战中，罗耀拉选择了中立，他主张“既不要为学术而牺牲神学，也不要为神学而牺牲学术”，由此他确立了耶稣会的基本特征：神学与科学的结合、严格的道德修养、重视提高教育水平。罗耀拉认为，“无论是以光耀文艺复兴的成就为借口把中世纪说得荒唐可笑，还是因盲目尊崇中世纪而藐视文艺复兴的成就，都是既违反信仰，也违背理性的。他和他的弟子们虔诚地认为，对古典文化和新知识的真诚热爱与神圣的基督教原理是浑然一体的”^[1]，二者并不矛盾。正是基于这种思想，罗耀拉确立了耶稣会的基本教育模式：“心灵功课”的修炼与学习人文知识、科学知识相结合的教育模式。他的教育目标就是培养具有虔诚的基督教信仰、具备良好的道德修养、拥有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科学知识的传教士。因此，他所倡导的教育独树一帜，极富特色，这一套教育理念与手段也是耶稣会成功的主要原因。

罗耀拉根据自己的灵修经验提炼出了一套的精神修炼方法，他把这套方法写成了《神操》，他坚信自己的《神操》“是革新人心，甚至改变整个世界的有力工具”。^[2] 罗耀拉的这套精神修炼法包括：自我审察、独创精神、英雄主义和爱。自我审察是最重要的一环，也是教育的第一个阶段，他要求每一个新成员必须参与一个用今天的语言可以称之为全封闭式的训练。在这段时间内，他们必须断绝和外界的一切联系，将过去习以为常的日常活动排除在心灵之外，把全部精力灌注于自我评估和定位，思考自己在生活中想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以及哪些缺点可能会使自身遭受挫折。通过拆分自己，帮助新成员树立起自知、真诚、英勇和爱的人格基础。

第二个阶段是运用冥想的方式塑造成员的独创精神。首先成员被要求想像有人因一笔飞来横财而改变了人生，这些人是否会因此真正得到人生的圆

[1] 林金水、邹萍著，《泰西儒士利玛窦》，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9页。

[2] 沈定平著，《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28页。

满?这一环节引导成员树立这样的理念:耶稣会并不要求人们处理掉他们的财富,而是要培养一种不为外物所束缚的“淡定”态度。通过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淡泊精神,让人们卸下所有的包袱,摆脱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束缚,轻装上阵,自由行为,以此激发人们的独创精神,去探索新观念、新方法,而不要墨守成规。

第三个阶段是英雄主义精神的培养。这一环节要求人们想象比自己实际能力更高的目标,激发自己的潜力,把自己的事业当做“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业”。最后,让成员从孤独的修炼和冥想中重新回到现实世界,将修炼者的收获从幻想中转移出来,用于现实世界——被爱控制的基督世界。罗耀拉认为通过这种独到的精神修炼能培养出具有自省精神、敢于冒险、雄心勃勃、思路开阔的思想者和传教士。

突出政策的灵活性。遵循伊拉斯谟的“真理,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均为神赐”的思想,罗耀拉认为为了实现“愈显主荣”的目标,必须首先适应人的性情,并爱他们,“争取他们的好意是必要的,这样他们可能爱我们并在他们心中为我们保留一席之地。通过亲密的交流,提及我们共同的东西,回避引起争论的东西,便可以达到这一目的”。^[1]耶稣会的灵活政策不仅表现在对待不同的信仰取向的人身上,而且在具体的管理办法上也灵活机动,不搞一刀切,同时还设立了灵活进取的教学方法和课程。所以,耶稣会学校也招收新教徒,并在一些问题上灵活处理。如路德派学生免背圣徒连祷文,胡斯派学生免受圣餐。不仅如此,耶稣会在一定条件下还使用新教作品,罗耀拉允许在学校中使用新教作者评注的经典文章。这样,在一些地区,耶稣会学校不仅坚定了天主教徒的信仰,也使一些新教徒改宗天主教,进而影响了学生的家人。利玛窦在中国传教活动所体现的融会贯通的高超技巧、博大精深文化素养就是这种人文精神和灵活有效的教育结果。

(三) 利玛窦——一个典型的耶稣会士

享有“西学东传第一师”美誉的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是

[1] Keith Randell. The Catholic and Counter Reformation[M]. London, 1990: 76.

伊拉斯谟、罗耀拉、耶稣会这一文化链条上的重要一环。利玛窦的故乡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意大利，1552年10月6日，利玛窦出生在意大利马尔凯省的马塞拉塔城（Macerata），他的一生有幸“处在欧洲冲出黑暗中世纪的繁华时代”，^[1]深受人文主义思潮的熏陶，尤其是利玛窦在耶稣会属下的学院和大学接受了良好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教育，这对他的一生影响至关重要。

1568年，16岁的利玛窦告别家乡，前往罗马求学。他先入日耳曼公学创立的圣母会，一边学习法律，一边开始严格的修身生活。1571年，利玛窦进入罗马圣安德初修院，经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皈依耶稣会。在初修院学习13个月后，于1572年9月15日“宣三誓”，即终生安贫、守贞和服从，然后进入罗马学院，直到1577年5月离开前往葡萄牙，成为正式的传教士。^[2]

在罗马学院，利玛窦于三个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宗教生活的确立、人文知识和科学知识的积累、与教会上层人士建立的良好关系。这些为后来利玛窦的中国传教事业、沟通中西文化的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首先，灵魂的修炼是罗耀拉对其成员的核心要求之一，是体验宗教生活并最终确立宗教生活的基本方式和途径，耶稣会士的“三誓”必须通过不断的灵魂修炼内化为自觉的行为。利玛窦在初修院和罗马学院的一项重要功课就是按罗耀拉的《神操》修炼“心灵”。耶稣会士的灵修并不“局限于冥思苦想、面壁思过的阶段”，而是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强调灵魂与精神的升华和净化，不在刻意的冥思追求中，更加注重日用人伦的道德性修养。同时，罗耀拉还要求教士们“接近现实生活并投身到时代文化生活知识的前沿，用广博的知识来充实和印证模范的道德生活”，^[3]尤其重视对现时代文化生活的知识学习与吸收，这些知识包括古希腊罗马圣贤的学说、当时人文主义的理论与思想、自然科学知识。这种积极进取的、神性与人性相结合的基督教人文主义灵修教育，为利玛窦一生形成良好道德修养、坚定信念、克服困难和获得悟性提

[1] 林金水、邹萍著，《泰西儒士利玛窦》，第8页。

[2] 澳门利氏学社主编，《利玛窦——一位耶稣会士肖像》，Macau Ricci Institute 2010年版，第11页。

[3] 沈定平著，《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第126页。

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其次，耶稣会良好的教育使利玛窦具备了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极高的文化素养，其中人文主义精神构成了利玛窦独特的人格魅力。耶稣会的学校，根据罗耀拉的标准，对执教的教师要求非常严格：第一，他们要有出众的个人学识。耶稣会规定，只有完成高等教育中的哲学课程的人才能在低年级任教，有几年低年级教学经验的人才能继续学习神学。阿奎维瓦（耶稣会长，1581—1615年在任）在任命编纂《教学计划》的六人委员会报告中说：“如果那些未来的教师由教学艺术高超的人来担任，在阅读、数学、写作、改错和班级管理方法等方面进行两个月或更长时间的训练，学生便会受益匪浅。如果教师不预先学会这些东西，他们以后就不得不在损害学生的情况下重新学习。这样，他们只能在失去声望之后，才学得本领，而且某些坏习惯将永远无法矫正。”^[1]第二，耶稣会特别强调教师自身的品行，罗耀拉认为这是教育体系的核心，是基督教化作用的关键。在西班牙耶稣会士佩德罗·德·瑞巴德尼拉1605年出版的《为耶稣会辩解的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要求，他说，对青年道德品质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是“教师的生活：他们越神圣、越完美，就越容易、越强烈地影响青年未成熟的灵魂、美德的形成和对正直生活的热爱”。^[2]

在这样优越而又严格的教育与学习环境下，利玛窦学习的主体知识是伦理学和数学科学。利玛窦自己偏好数学，师从著名的学者克莱维斯神父，四年学习生涯中，他倾注了大量的时间、精力钻研数学，收获甚大。通过这一刻苦的学习，确立了利玛窦的基本思维方式和看问题的特殊视角，这就是把数学看作是一切科学的基础；除此之外，利玛窦还“精通包括欧几里得几何、行星理论学、基督教教历在内的计算理论，运用仪器观察行星和地理测绘的实用技术，以及制作星盘、钟表等技巧”^[3]，这就是为什么利玛窦在中国传教时首先因数学方面的知识而获得巨大声誉的原因。

[1] 威廉·博伊德著，《西方教育史》，任宝祥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16—217页。

[2] William J·O Brien.Splendor and Wonder., Jesuit Character, Georgetown Spirit and Liberal Education[M]. Washington: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1988.12.

[3] 沈定平著，《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第294页。